

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评析

徐 梅

摘要: 本文从区位选择和区域经济增长两个方面,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为主线,对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最新理论观点进行评析。认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无法解决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厂商生产能力内生规模报酬递增之间的矛盾。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下构建生产要素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模型,力图把“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关注。

关键词: 区位 区域经济增长 不完全竞争 规模报酬递增 新经济地理学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区位论与发展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发展而来。它形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目前,一些经济学家正在努力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把空间因素引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模型。然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取得新进展的同时,也面临新的困惑和问题。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 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 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 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 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 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 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

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 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 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Isard, 1956, 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 and 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

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 1957)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 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外围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外围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 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 Krugman)、藤田(Fujit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 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理论纳入主流经济学。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 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

与普里德(Bred, 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状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瓦尔兹(Waltz, 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马丁(Martine, 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藤田和莫瑞(Fujita and Mori, 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特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 1996, 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

复。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 - Ohlin 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 and Forskild, 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阿罗(Arrow, 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 1986)在其知识溢出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 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 and Sala- I- Martin, 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 J. 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 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

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 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供产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

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学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当然,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在取得重要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困惑和挑战。在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制度和个人的偏好仍然被看作是外生给定的,因而无法利用现有的理论框架来说明经济制度和个人的偏好变化对区位选择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包括新经济地理学在内的经济学家们,对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强调面临着网络经济现实的挑战。网络经济的出现使许多生产无形产品和服务的产业的区位选择几乎不受运输成本的限制,而消费者偏好对其的影响却大大增强。除了理论上的不足外,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虽然在动态化、综合化、模型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整个理论研究还缺乏系统性,研究文献广泛的分散于其他相关理论中,研

究方法仍不规范,有待进一步系统化和标准化。

参考文献:

1. Benjamin Higgins, Dinald J. Savoie, 1997.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ies & Their Applicatio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 David F. Batten, Mandred M. Fischer, 1996. Geoffrey J. D. Hewings, Peter Nijkamp, Folke Snickars, *Recent Advances in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ling,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s*,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Berlin.
3. Paul Krugman, 1998. *Space: The Final Fronti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ume 12, Number 2, Spring 1998: 161 ~ 174.
4. Paul Krugman, 1999.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3), pp. 483 ~ 99.
5. Fujita M., P. Krugman, 1995. *When is the Economy Monocentric: Von Thunen and Chamberlin Unified*,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5 (4): 505 ~ 28.
6. Fujita M., T. Mori, 1996.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7 (4-5): 399 ~ 442.
7. Venables A., 1996. *Equi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7(2): 341 ~ 59.
8. U. Walz, 1996. *Transport Costs, Intermediary Goods and Localized Growth*,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6.
9. [美] 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 中文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0. 杨吾扬, 梁进社:《高等经济地理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11. 刘乃全:《区域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 载《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0(9), 17 ~ 21页。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 成都 610064)
(责任编辑: Q)

(上接第 73 页)

合法的经济行为的信号收集, 尽管有时滞但最终可以获取, 而信息时滞常常事过境迁, 使管制政策无法落实, 这就是某些管制措施是临时的且容易变更的主要原因。当然有些经济行为是非法的, 例如地下经济行为, 管制机构很难获得这些活动的真实信息, 因而对它们的管制无法形成闭环的控制回路, 只用开环的管制方式直接取缔。

测量和传输滞后。测量上滞后是由于管制的信息采集部门自身特性所引起整个管制回路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动态误差。市场的均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从某个时点上看, 供求关系与价格均会有所变化, 尤其是价格的波动极为频繁, 这种信息采集上时滞导致采用管制目标值与实际值在幅值变化和相角的滞后, 这就可能使控制器输入与预想有偏差甚至完全相反的信号, 其管制的最终结果可想而知。信息传递的滞后, 主要指整个管制控制模型中各个环节之间的信息传输不是瞬时完成的, 有一定时滞。这种时滞随着管制的不同、信号传输路径的不同、各个环节之间的彼此关系不同差别很大。例如, 采用中央集权的管制方式的信号传递路径和采用市场传递信息路径造成的时滞是完全不同的。

由于测量和传输时滞主要来自控制与系统管制的内部, 采取相应的措施可以减少甚至消除它的影响。主要采用预先调整的方法, 根据以往的经验, 对政策可能造成的时滞及其影响通过对管制机构内部特别是控制器的功能的修正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应该承认, 除了管制机构自身的缺陷外, 时滞常常是“管制失败”的重要原因, 为了克服时滞的措施可能会带来别的时滞。

总之, 管制与寻租具有与生俱来的联系,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都不可能因寻租的存在而放弃令人喜忧参半的管制, 这也许就是研究管制与寻租的意义所在。

注释:

1. 乔治·斯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 中文版, 211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2. Spulber, D. F., 1989. "Regulation and market", pp. 51, The MIT Press.
3. 劳杰·克拉克:《工业经济学》, 中文版, 262 ~ 269页,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0。
4. 汤敏, 茅于軾:《现代经济学前沿专辑》, 第2辑, 153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5. Stigler, G. J., 1971.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pp. 3.
6. Posner, R. A., 1974. "Theories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5, Aug, pp. 335 ~ 358.
7. Posner, R. A., 1975. "The Social Cost of Monopoly and Reg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3 Aug, pp. 807 ~ 827.
8. Krueger, A. O., 197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 Seeking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74, pp. 291.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南京 210093
东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南京 210096)
(责任编辑: N)